

翻譯研究與世界文學的內在連接

陳永國

【提要】 本文主要討論翻譯與世界文學的內在關聯和翻譯在世界文學傳播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旁涉翻譯學科在大文科內的邊緣位置。就翻譯與文學、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研究以及與語言自身的關係而言，邊緣位置恰好是翻譯的本質，因為這個位置就是學科間、文化間以及國與國間的邊界位置，因此也是一種連接。語言的連接作用是以翻譯為具體體現的，這種功能內嵌於語言內部，不僅在多語言之間，也在單語言內部。在某種程度上，沒有翻譯便沒有世界文學，而沒有以翻譯為體現的語言連接和文化連接，便沒有世界主義。

【關鍵詞】 翻譯 世界文學 內在連接 翻譯的世界性

【中圖分類號】 I0; H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 (2016) 04 - 0162 - 09

在《譯德里達論翻譯：確切性與學科抵制》一文中，^①勞倫斯·韋努蒂談到翻譯學科在美國的邊緣性，現行的“文化制度限制了”那些“想要研究和從事翻譯實踐之人的機會”。由於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霸權，英語已經獲得並始終維持其同樣“全球霸權”的地位，但同時也導致了“不平衡的文化交換”，意即，英語語言成爲了“被翻譯最多的語言”，但却相對“極少被譯入”，而這或可成爲美國“翻譯學科邊緣化”的理由（這似乎恰好與中文相反：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文成爲中國圖書市場上被譯入最多、被譯出最少的語言）。^②韋努蒂所暗示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越來越多的英文書，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名著，被譯成其他語言，而非相反。^③從其他語言譯入英文的實踐在不同方面遇到了抵制：除了對被譯入主體（如德里達）的專業瞭解外，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欲望，翻譯的欲望和意志。按韋努蒂所說，翻譯是一項艱苦的任務，不僅因爲“確切的翻譯”是不可能的，還因爲翻譯不可避免地遇到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倫理、法律和制度上的障礙，這些還僅僅是一個譯者可能面臨的最明顯的困難。這些“複雜的因素”使得本來就艱難的翻譯愈發艱難，使得本來就難以完成的任務愈發難以完成。然而，翻譯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在另一篇題爲《翻譯研究與世界文學》的文章中，韋努蒂說“沒有翻譯，世界文學就不可能被概念化”。從讀者的角度看，“世界文學包含的原著比不上譯文多——也就是說，外文文本被譯入讀者所屬的特定群體的語言，這種語言通常是標準方言或多語環境中的主導語言。

翻譯因此促進了文學文本的國際接受”。^④不必說，對於民族文學而言，如果要擺脫單語制（monolingualism）而進入多語和多文化環境，翻譯是必不可少的，而這種多語和多文化環境正是世界文學誕生的條件。

韋努蒂至少有兩點是正確的。首先，翻譯艱難但我們不得已而為之，因為語言為一、且為多。韋努蒂引用德里達的話說：“我們從來只講一種語言——而且，由於這種語言回歸他者，所以它的存在是非對稱的，始終是為他者，來自他者，為他者而保存。來自他者，與他者共存，並回歸他者。”^⑤韋努蒂把這個“他者”解釋為文化制度或政治權威，但也可以是任何話語，學術的或殖民的，倫理的或法律的話語，試圖把單語制強加於個人或“個人為其成員的群體”。^⑥這個“他者”與單語制之間的關係是權力與話語的關係，“作為文化制度或政治權威的他者總是要強加一種單語制，學術的或殖民的話語，以尋求同質化，限制語言的應用”。^⑦他者和單語制政策都是語言的內嵌因素，是促成日常言語的因素，不僅是自行譯入的途徑，而且是將自己譯入他者的手段。如多米尼克·澤沃利諾所言：

說話已經是翻譯了（甚至在講自己的民族語言或對自己說話時）；此外，你必須考慮到語言的多元性，這要求與不同他者的比較確切的相遇。你會禁不住誘惑地說，存在著一種語言的多元性，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多元的。與他者的相遇不可避免。如果你接受了這種相遇的必然本質，如巴別神話所受到的闡釋一樣，那麼，語言多元主義就不再是一個詛咒了，而是一個條件，要求我們放棄宏大的完美語言之夢（所謂的一點不喪失的全球翻譯之夢）。個體語言的片面性和有限性就不被看作不可逾越的障礙，而成為個體間交流的條件了。^⑧

你不可能避免與他者相遇，也不能避免翻譯的問題，即為自己翻譯和為他者翻譯的問題。你說話或準備演講的時候，已經陷入了翻譯的問題，如德里達或韋努蒂在準備他們各自的演講時一樣。德里達說：“事實上，我用我自己的語言即法語準備這個研討課的時候，我明白我必須用英文，而一旦譯成英文，我就已經面對這些問題了。”這些問題不是“偶然事件或語言的外在局限，而揭示了事件的結構和錯綜複雜的關係”，^⑨比如，當你和別人說話時，或閱讀一個他者時，或給一個他者寫信時。對德里達和笛卡爾來說（如英語對韋努蒂來說），法語是許多自然語言中的一種。這種自然語言被這兩位哲學家使用時，或被他們用來“證明可以用一種自然語言來談論哲學”時，就笛卡爾的情況而言，這種哲學在他之前就已經用希臘文和拉丁文表達過了；而就德里達的情況看，這種哲學也涉及德語、英語和他自己的母語法語。這種自然語言（笛卡爾和德里達的法語，韋努蒂的英語和意大利語）及其哲學的單語表達，在他們使用之前就已經是多元的了，也就是說，已經被從蘇格拉底到當下的哲學家們所用過了。這種自然語言顯然是“本土的或民族的”，也是“特殊的和歷史的”，“是世界上最少具共性的東西”。^⑩但這個“世界上最少具共性的東西”却是普遍的，是每一個能談論它的人所共享的，也就是說，一旦轉向話語或與話語相對立，如著名的“索緒爾式對立”，即語言的共時系統與言語的事件相對立時，凡是交流的人都要使用它。這種對立，包括社會制度與個體的對立，已經提出了許多問題：一方面，這種自然語言，即主導的民族語言或在歷史的特殊時刻作為國家的語言，對立於不同的“服從於同一國家權威、構成消散的或離心的力量的民族習語”，冒著“分解甚或顛覆”的危險；另一方面，“這同一種主導的民族語言，國家的唯一語言，將與其它自然語言（無論‘死的’或‘活的’）構成對立，出於技術的或歷史的原因，對這些自然語言應該進行細緻的分析，它們已經成為哲學或技術

科學交流的特殊媒介：笛卡爾之前的拉丁語，今天的美國英語”。這些問題以其抵制翻譯的衆多含義變得特別複雜。我們只能說“它們是多元的，同時又是社會政治的、歷史的、宗教的、技術科學的，教育的，如此等等”。^⑩它們給譯者造成極大的困難，使翻譯成爲一種“穿透性勞動”（弗洛伊德語），一種既是記憶又是悼念的勞動，一種共同經歷的緊張、折磨、苛刻批評、默默無聞，等等。譯者必須忍受，尤其是在人文學科不受重視的一個社會裡。

韋努蒂第二個正確的地方是對當下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方向的評論：“文化研究的理論指向已經把對特定文本的研究和翻譯實踐邊緣化，而翻譯研究的經驗指向則把對哲學和文化政治問題的探討邊緣化。”^⑪這兩個牢固且被嚴重制度化的領域目前正朝著不同方向邁進，造成了二者間發展的失衡：“忽視對翻譯物質性的文化研究；和……忽視伴隨著每一種翻譯實踐的哲學內涵和社會效應的翻譯研究。”^⑫韋努蒂能够合理地得出結論，說這種忽視造成了翻譯的邊緣化，而這種邊緣化是雙重的：“文化研究中重要作品的理論影響”和“翻譯研究中盛行語言學方法的經驗主義”。^⑬正是這兩個側重面限制了對翻譯的理解和發展。

韋努蒂所說的“翻譯研究在美國的制度命運”似乎並不比在中國好多少，儘管中國和英國、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一樣，也目睹了“譯者能力訓練的大幅度發展”。1980年代以來，教育部新增了翻譯學研究生學位，2007年再次新增筆譯和口譯碩士學位項目（MTI）。但是，當我們轉向學術界對翻譯研究的“學科抵制”時，情況並不比美國好，甚至更糟。“對創新和認識創造的秘密抵制，對思想和自由批判精神的反感”愈加強烈，“翻譯的純粹實踐性”得到片面的強調，翻譯理論研究的重心偏向語言學和或多或少文化的方面（後者，即所謂的文化翻譯的研究也僅僅開始於1990年代之後）。儘管克羅齊、本雅明、羅森茨威格、斯坦納、奈達、德里達、德曼、利科等西方思想家論翻譯與語言哲學的著作和文章得以譯成中文並進入大學課堂，但有關翻譯的一般研究仍限於嚴復確立的“信達雅”的標準。只是近十幾年來（進入21世紀以後）才聽到文化翻譯的聲音。巴斯奈特、根茲勒、斯皮瓦克和韋努蒂等英美教授的著作也大量翻譯過來，但翻譯研究內部“學術的反思想主義”或學科抵制依然如韋努蒂所說，聚焦於“文本分析的數據而犧牲了翻譯中出現的各種哲學、文化和政治問題”，“狹隘地聚焦於微小的語言材料和實踐而排除決定性的社會考慮的經驗主義，如譯者責任和譯文讀者等問題”。專著和博士論文要麼討論莎士比亞、浪漫派詩歌、現實主義小說等外來資源的翻譯，要麼對比中國經典外譯的優劣，大多就形式和主題展開討論，包括語義、句法、風格和韻律，而極少涉及政治、倫理和哲學話語。舉《水滸傳》這部中國古典名著爲例。1933年賽珍珠將其譯爲 *All Men are Brothers*，1937年 J. H. 杰克遜將其譯爲 *Water Margin*，1960年沙皮羅將其譯爲 *Outlaws of the Marsh*。細節研究都用在了翻譯策略、風格比較、語義層面的信與達等，而蟄伏在譯文背後或三個不同題目之間的政治、意識形態、哲學或思想內涵却幾乎無人問津。簡言之，“翻譯研究中盛行的經驗主義側重衍生於語言學的分析概念，且不管其解釋力有多麼狹窄或有限”。^⑭

韋努蒂就這種經驗主義翻譯研究提出了兩個“嚴重局限”：“首先，由於這個方法提出和採納了如此複雜的分析概念，所得出的更多的是一些不必要的細節並以此來解決翻譯問題，有把翻譯研究與應用語言學合併的危險。”^⑮其次，“譯者得到的是欺騙性觀點，不僅認爲這種分析描述公正，而且足以提出、解釋和評價翻譯的決定因素”。^⑯因此，“從長遠來看，翻譯研究中的經驗主義抵制那種思辨式思維，即鼓勵譯者就其翻譯提出的文化、倫理、政治問題進行反思的思維”。^⑰那麼譯者怎樣才能設法逃出“翻譯研究中這兩種方法的不相容性，一種充斥著語言學知

識，另一種充斥著文學和文化理論”，而這種不相容的結果就是翻譯的邊緣化呢？通過詳盡闡述他自己經歷的一種“介入性翻譯”（翻譯德里達以“翻譯的相關性”為題的講演），通過實施菲利普·劉易斯提出的“濫用的忠實”，即“注重實驗、篡改用法、創造符合原文的多價性、多聲部或表達重點”的一種翻譯，^⑨韋努蒂設法保留了德里達講演中的多語主義。一方面，通過保留“relève”一詞的原型而“迫使讀者重複翻譯的行為”，或“把讀者帶給作者”；另一方面則嘗試擴展性翻譯，“厘清德里達演講中積累的意義範疇”，以便“揭示德里達演講中體現和隱藏的闡釋行為，進而產生去魅的效果”，^⑩實現“把作者帶給讀者”的目標。“把讀者帶給作者”和“把作者帶給讀者”之間的交換是施萊爾馬赫提出的打破翻譯之悖論的一個方法，按羅森茨威格的說法，“翻譯……就是服侍兩個主人：外國人和他的作品，讀者及其挪用的欲望，外國作者、讀者與譯者同時寓於同一種語言之中”。^⑪這或許就是“濫用翻譯”的手段可能導致的一種變化；這或許就是介入性策略所能減少的譯者的不可見性；這也或許是一種“相關性翻譯”所能要求和給予的，即對英語的全球統治在文化和社會上予以地緣政治意識的反應。

二

然而，譯者以及翻譯自身的不可見性和默默無聞並沒有減弱，正如英語的全球統治仍未減弱一樣。“relève”依然是“relève”；它作為一個詞是“不可譯的”（德里達語），而實際上也確實未譯（韋努蒂的做法）。但這並非什麼出新的做法。比較文學的創始人之一、語文學家列奧·施皮策在1930年代就已經實踐過了；當時他在伊斯坦布爾從事語文學研究，提出了一種“全球翻譯”的方法，一種不譯的裸語狀態，一種被視為神聖的干擾“單語制”之得意姿態的原則，因此是“多語相遇時舞臺上發出的不諧和音”。^⑫施皮策試圖介入的單語制指的是完美翻譯中的一種統一語言，旨在實現譯文中的“絕對相關性，最適當的、充足的、單聲的透明性”。^⑬但是，這樣的與原文毫無差別的完美譯文只是一個神話，是巴別塔塌倒之前的一種語言的理想化和幻想。按阿普特所說，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歐洲文學學者通常“不去管一些段落和短語，使其處於不譯的裸語狀態”。對於掌握二十幾種語言的施皮策來說，未譯的詞、短語或段落造成了多種語言的不諧和音，因為“詩人的用詞”，“我的獨特結論的說服力和力度”以及“原文中微小的語言細節”是不可譯的。^⑭他堅持讓讀者直接面對語言的怪異性，從而散發出原文的洋味兒以便達到盡可能接近的“要點，幾乎與未譯一樣”。^⑮這種完美的翻譯模式把施皮策與本雅明、阿多諾和保羅·德曼等文化批評家、理論家和思想家聯繫起來，他們都把譯文中的洋味兒描述為“把外來詞的銀制肋骨插入語言的身體之中”，並用這肋骨表達語言中和翻譯現實中的“痛苦”。^⑯在翻譯中，這肋骨就是“原文之痛”，“語言的無底洞，存在於語言自身的破壞性本質”。^⑰對本雅明來說，它造成“原文的疼痛”，“歷史創傷的語言，彌賽亞的語言，流亡的傷痛等”，所有這些都相關於“結構的不充分性，而這最好要根據非人的、語言學的非人化語言來分析，而不是進入形象的、轉義的、創傷的或戲劇的語言之中”。^⑱在施皮策的“語言的洋味兒”和德曼的“語言的非人文主義”背後是對語言本身的熱愛，在譯者、批評家和讀者統統投身於語言的時刻，始終存在著對那種語言、那首詩的無條件的愛。^⑲

因此，據阿普特所說，施皮策開創了關於原文語言的一種倫理學，這種倫理學不讓原文屈服於翻譯，並據此把“全球翻譯”定義為“據不可譯的情感差異構型的翻譯，無法追蹤的語義差異的結點，激烈的文化傳輸和反傳輸，以及預料之外的艷遇等插曲”。^⑳這種世界範圍內的語言交

流含有跨國人文主義的種子，即“全球翻譯”或我們現在意欲稱之為的世界文學的種子。它表明“語文學人文主義的遺產不是、而且從來不是西方對立於非西方的問題框架；它是、而且始終是思想進出口的歷史，其中，起源的標籤已經被撕掉”。^⑩甚至施皮策曾教授過語文學、奧爾巴赫曾尋求並獲得了教職的那座城市現在也帶有了世界文學學科形式的痕迹，那裡，“東西的文化疆界已經模糊，殖民歷史的層次塗抹了本土文化的輪廓”。^⑪疆界的消失意味著“翻譯的運動”，和對翻譯運動的研究。“*translatio*”一詞本身就有運動的意思，如“*translationstudii*”這個術語所示，它的意思是知識或學問從一個地方向另一個地方的傳輸，從一個歷史時間向另一個歷史時間的傳輸。有趣的是，（按阿普特所說）傳輸的路線隨著太陽轉動的路線，從伊甸園到耶路撒冷，到巴比倫，從知識的誕生地雅典，到羅馬，到巴黎，到倫敦，直到18世紀俄國人的介入，這條路線才被打斷。這個概念從根本上說是關於文本的，也即閱讀、翻譯、評論、闡釋和重寫的本體內活動，有趣的是，知識和學問這種傳輸始終先於並主導著“*translationimperii*”，即幫助文化傳輸的統治或權力的傳輸，或相反。

在《如果有翻譯的理由》一文中，德里達說：“一本譯文從一個語言場所走到另一個語言場所，從起源到非起源，這個非起源將不得不是、或據權利而應該是、並在權利或律法的語言中就是起源。”^⑫這裡，知識、學問、或許權力和文化的傳輸是在語言中進行的，“從一個語言場所到另一個語言場所”的運動，即從希伯來語和阿拉姆語到希臘語、拉丁語、德語和英語，而這就是翻譯的歷史，上帝之言《聖經》的傳輸，從起源，即希伯來語（如果我們不追溯希伯來《聖經》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它之前的傳奇式歷史的話），到非起源即七十士譯本，而這個非起源，《聖經》的希臘文譯本，卻又成為聖哲羅姆的拉丁文譯本的起源，後者反過來又成為路德的德文譯本和詹姆士王的英文譯本的起源。《聖經》翻譯的這些功績，語內翻譯史上的這些里程碑，證實了德里達所說的翻譯的運動，即從一個起源希伯來文《聖經》到一個非起源七十士譯本的《聖經》，後者又成為另一個非起源的起源，依此類推……按德里達所說，這個非起源“將不得不是”起源，而且“應該是、且有權”成為一個起源。他認為在這個運動中所運輸的或傳輸的已經在翻譯中發揮了作用，而運動的路線“就口語表達的常識而言，並不遵循語言之間流通的一條直線，而在書面語言的嚴格意義上，是文本”。^⑬

翻譯一個文本，如把笛卡爾的《方法論》譯成另一種語言，即拉丁文，就等於“以書面語言傳達書的信息，或使其在某些條件下對某讀者是可讀的——為某些地區所有有能力的主體，即便就語言而言他們沒有能力讀法語”。早些時候，德里達曾問：笛卡爾為什麼同意將其譯成拉丁文，一種已死的語言？哪裡會有人認為有理由把一種活的語言譯成一種已死的語言？一種沒有人說的語言？回答是：“翻譯就是書面語的翻譯，是把一種可能的言語譯成書面語。”^⑭這種可能的言語就是笛卡爾1637年寫《方法論》時用的言語，“一種庸俗化的語言”，即法語。《方法論》是一部哲學著作，根據當時的寫作方式，應該用一種正式的規範的語言拉丁文來寫，但笛卡爾“偶然地由於某種偏離甚至僭越”，“開始使用了某種庸俗的語言”，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和原因再將其譯回拉丁文，那是“規範的源語言”。此外，據德里達所說，《方法論》根本不是起源，而不過是寫於1626～1628年的《指導哲理之原則》（*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 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的法文譯本，“那是用拉丁文撰寫的，比《方法論》早八年”，是在《方法論》書寫之前的“一本隱藏的原文”。

這裡，書寫和翻譯的界限模糊了，也就是說，起源或原文（法文版的《方法論》）成了自己

的譯文（拉丁文的《方法論》），而後者才是起源或規範語言中的原文。但是，這個原文/起源（法文或拉丁文的《方法論》）或譯文/非起源（分別為法文和拉丁文的《方法論》）却又是另一個原文的譯文，即用拉丁文撰寫的《指導哲理之原則》。於是，我們不得不問：《指導哲理之原則》是否也是另一個原文的譯文？一個起源的非起源，或一種非譯文的譯文？我們是否應該把譯文或翻譯視為某種漂浮物，像漂浮的能指，不管有沒有超驗能指（上帝、理性、精神或大寫的語言等等），在意指過程中始終漂浮，意義始終被延宕？譯和重譯的這種無休止的運動是否在某方面說明了世界文學的內在本質，即作為一種人文主義活動，沒有翻譯它就是不可能的？

三

大衛·達姆羅什在《什麼是世界文學？》一書中給世界文學下了一個三分定義：“1. 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型折射。2. 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獲得的書寫。3. 世界文學不是固定的正典而是一種閱讀方式：對我們所處地方和時代之外的諸多世界的一種無利害關係的獻身。”^⑥世界文學不是民族文學的組裝，而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型折射，儘管它始終在民族文學之中。民族文學一旦成為了世界文學，就必然在外國文化中占據一個位置，在兩種不同文化和兩個不同傳統之間、也即在源頭和寄主之間協商。它携帶著源頭文化的標記，當這標記離家越來越遠時，其踪迹將“越來越被沖淡”，“越來越被明顯地折射”。這種雙重折射創造了一個橢圓型空間，這便是世界文學得以存在的空間：“與兩種文化相連接，又不單獨為其一種文化所局限。”^⑦這個隱喻承載著翻譯的形象，即兩種文化連接的結點，儘管在翻譯中，語言經歷了根本的改變，這不同於民族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改變。本族文化試圖用以界定自身的那種“根本他性”現在已不僅是外語中的他性，也成了目標語中的他性。這裡提出的問題仍然是譯文中的他性或洋味兒。“譯文何以反映了原文的洋味兒？它該在何種程度上符合寄主國家的文學規範？太多洋味兒的文本會令新的讀者迷惑不解或厭煩，太多的同化會失去差異，而這差異恰恰是作品值得翻譯的價值所在。”^⑧

暫且不論語言難點、不可能性甚或喪失，在翻譯中獲得的世界文學正是通過順應讀者的私人經驗而強化了“讀者與文本之間自然的創造性互動”。這是一個非常苛刻的讀者，而文本的字裡行間也“充滿了歷史和文化的共鳴”。^⑨它立於語言森林之外，面朝“長滿樹木的山脈”，讀者以及作為作者的譯者會在自己的語言中聆聽從山裡傳來的回音，即“作品在異族語言中的震顫”。^⑩而當山脈上的樹木越來越密，越來越多的外來作品在我們心中產生共鳴，使那震顫越來越強烈時，我們對世界文學的閱讀就變成了“一種更加超然的參與模式，進入了與作品的一種不同的對話，不是涉及認同或控制的對話，而是關於距離和差異的學科。我們不是把作品作為其源文化的核心來相遇，而是參與可能來自非常不同的文化和時代的作品產生的力場”。^⑪

這種雙重的橢圓型折射清楚地表明，世界文學不是對單一源文化的再現，而是許多源文化的融合；它不是不同民族文學的簡單或純粹組裝，而是所有民族文學進行改造、重構和綜合的一種文學。經歷了這種雙重折射之後，民族文學經過了改造，並在“翻譯中、在新的語境中得以重構”，^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達姆羅什才說“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獲得的書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努蒂才說“沒有翻譯，世界文學便無法被概念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得以按照達姆羅什的解釋把世界文學視為“一種閱讀模式”，借助這種模式，我們才能以客觀的眼光和“無利害關係的參與”觀察其他地方和其他時代的“世界”。世界文學的再現、生產和接受都或多或少由譯者的任務所界定，這項任務雖然艱巨，但却使譯和重譯構成了一個意指鏈，其中，

一個非原文從原文中生產出來，而原文的可譯性或不可譯性並不是它自身的屬性，而是在其“後世生命”中實現並獲得的一種潛能。因此以新的形象和新的形狀獲得了新的生命。

在《論翻譯》一文中，保爾·利科開拓了一種新方法，以解決“重要作品不斷重譯的較一般的問題，包括全球文化中的偉大經典，《聖經》、莎士比亞、但丁、塞萬提斯、莫里哀”（後來他又在這個名單上加上了荷馬）。他指出，從柏拉圖到尼采到海德格爾的偉大哲學家們都把譯文和重譯融合到世界文學中來，或者說，把譯文和重譯看作是世界文學。他甚至提出頗具建設性的主張：“正是在重譯中我們最清楚地看到翻譯的衝動，即由於對現存譯文的不滿而促發的衝動。”“僅就我們文化中的偉大文本而言，我們實際上仰仗一遍又一遍重譯的譯文。”^④從譯者的角度看，譯與重譯的過程，翻譯的衝動和欲望，要攻克外來文本對翻譯的抵制、攻克時常出現的不可譯性的意志，“擔負‘衆口皆批’的忠實和背叛問題的勇氣”，^④以及對完美翻譯的彌賽亞式的期待，所有這些全都聚斂在“我們所仰仗的”這些偉大作品之上。

那麼，是什麼促成了這種聚斂或“全能翻譯”？拉庫-拉巴斯和讓-盧克·南希將此歸在“文學絕對值”的項下，它控制著以不同名稱標識的德國浪漫派的事業：“歌德的目標語的‘再生’，諾瓦利斯的源語言的‘潛能’，和洪堡特論這兩方面時提出的二部教育過程的聚合。”^⑤在此，這三位德國浪漫派都把譯者的任務看作是恢復目標語的生命，無論是德文與否，同時增進源語言的力量，也不論是德文與否，而且，這種聚斂“翻譯作品和‘關於教學和想像的某種思考’”，最後以“教育”結束：“建立完整圖書館的夢想，即通過積累而使圖書館成爲書，所有語言的全部作品之譯文的無限分支的網絡，具化爲一種普世的圖書館，一切不可譯性都將在此抹除。”^⑥

在閱讀世界文學過程中將被抹除的不可譯性不過是譯者在翻譯行爲之內和之外所遇到的不同抵制：充斥著刺鼻洋味兒的外國作品的高大塔樓，每一個譯者都爲之努力的毫無丟失的完美翻譯，以及擔心不能獲得純語言的恐懼——在每一種翻譯行爲中產生共鳴的彌賽亞回音，每一個譯者注定要在孤獨的默默無聞中忍受的憂鬱和背叛感。但是，所有這些的抹除並不意味著完美翻譯所能獲得的對原文的抹除。如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所解釋的：憂鬱的譯文使原文獲得了後世生命，使原文進入了一種關係（這實際上就是可譯性這個術語的意思），但這種關係不必是人類關係，比如，我們需要理解用外語寫成的著作，但在關係概念上，各種語言相互關聯並不是爲了滿足人類傳遞信息和意義的需要，而是揭示語言意指方式相互作用中產生的純語言。

譯與重譯構成了語言意指的運動，其結果是意義的儲存。語言不是由其指涉來區別的，而由用指指涉的不同方式，即指意的模式來區別。“構成翻譯媒介的是各種意指方式的差異性的相互作用，而‘譯者的任務’是揭示每一個自治的意義單位總是被其意指方式所超越，從而使這些相互作用爲人所理解。”^⑦與他之後的許多批評家和思想家一樣，本雅明是在研究德國浪漫派和德國巴洛克戲劇時提出語言和翻譯思想的，試圖表明在藝術品和救贖作品中，表面上穩定的自治意義狀態仍隱藏著動力和機制。在他的研究中，翻譯和可譯性是一個範式，表明一件作品不是自治的或持久的，而只是不斷的運動的一個停泊地，所以，翻譯的任務不僅是交流意義，而且是意指象徵化的運動。這種運動首先已經存在於原文之中，然後在原文與其替代物之間、在接受與錯位之間運動。“可譯性是一種從來不可能實現其意義的潛能，既如此，它就構成了一種方法——意指的方法——而不是內容。”^⑧（也就是達姆羅什所說的“一種閱讀方式”）。

在1984年做的一次演講《翻譯的神學》中，德里達試圖使翻譯的問題“盡可能地最接近於浪漫主義的問題”。他說：“大體上說，我們所說的德國浪漫主義同時也是緊張、不安、被折磨

的時刻，對翻譯及其可能性、必要性、對德國語言和文學的意義的執迷進行反思的時刻，而且是關於修養（Bildung）、想像（Einbildung）和教育（bilden）的全部變體進行某種思考的時刻，這三個詞都可以準確地稱作翻譯的衝動、譯者的任務、翻譯的職責。”^⑨不管德里達如何界定德國浪漫主義，術語還是運動，它本身始終都已經是一種翻譯了（而且在引申意義上，一切文學、一切哲學、一切知識都已經是翻譯了）。浪漫派運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母語，即德語，但思想和詞彙都帶有洋味兒，為這種特定語言劃定邊界，將其分隔力量糾纏起來，干擾了這種想像的民族方言的純潔性。如德里達和達姆羅什以及一些翻譯批評家所闡明的，洋味兒總是有的，語言之外的東西，已經是他者的東西，總是有的。利科說：“在每一個他者中總有外來的東西。就好比我們幾個人同時界定、重構、解釋，我們用另一種方式說同一件事情。”“總是有可能用另一種方式說同一件事情。”^⑩其理由在於，在翻譯中如在寫作中一樣，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即所謂的翻譯，涉及詞、句和文本。詞是“我們在詞匯中發現的符號”，其內涵“並不都是思想，而有情感；並不都是公開的，而特屬於某一團體、某一階級、某一群體、甚或某一秘密社團”。所以，詞的意思都由其應用所界定。句是詞的序列，話語的第一個單位但還不就是話語，它們與所指、與指涉、與世界處於含混的關係之中，我們永遠看不到完整的、清晰的、終極的關係。而文本，“只有文本”，那些了不起的敘事，了不起的句子序列，它們關係到講故事的方式、情節的改變、論證的策略，也關係到諸如轉義、隱喻等風格手法，以及哲學、法律和政治等領域中的道德教育，這些才是有待於翻譯的。文本，而不是詞，不是句子，才是譯者要最先面對的。

太初有詞，有詞就有文本。文本是“文化群體的組成部分，通過這個群體，關於世界的不同看法才能表達出來”，之所以不同不僅因為民族的與外來的相對立，還因為在民族或群體文化內部存在著看世界的一個網絡，秘密的或是競爭的網絡。“我們只來看看西方及其連續不斷的貢獻者吧，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西方那些競爭性的自覺時期，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良到啓蒙運動到浪漫主義。”^⑪這些運動都是意指運動的不同的停泊地，譯和重譯的鏈條，它給西方文明以後世生命，新的生命，和延續的生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些翻譯理論家才說翻譯就是理解舶來品；翻譯就是考驗對舶來品的態度；翻譯就是創造舶來品（鮑曼、利科、德里達）。

最好把這種舶來品看作一種需要，那些需要翻譯的人們要把人類交流擴展到自己的語言群體之外，那些商人、旅游者、大使甚至間諜們。但對翻譯懷有最大欲望和最有激情的、因此也對世界文學有最大需求的譯者，是德國浪漫派，他們在面對譯文的同時思考學問和想像，也就是把翻譯與修養和想像、最終與教育聯繫起來了。他們不僅是論翻譯的思想家，也是翻譯的實踐者，從偉大的作家歌德到偉大的語言學家洪堡特，到諾瓦里斯、施萊格爾兄弟、施萊爾馬赫、荷爾德林以及荷爾德林的後裔瓦爾特·本雅明。他們感到了翻譯的衝動，翻譯的職責。在他們之前，還有路德，被聖哲羅姆的拉丁文所迷惑却又要直面它的路德，對他來說，把《聖經》譯成德文的衝動和職責結果證明是同類物的建構（可與聖哲羅姆《聖經》相媲美的東西），可以與起源或非起源相媲美的東西，而更重要的則是德語語言的創造。德國浪漫派從康德那裡學會了如何過一種理性的生活，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偶然的生活，一種要履行其翻譯職責的翻譯的生活。而這種職責，作為一種職責，是為另一種衝動所驅使的，驅使他們去別樣思考和別樣行動，去充當不同於其父兄、令其父兄聞到洋味兒的浪漫派。

迂迴但却回味無窮，難以忍耐但却魅力無限，翻譯的任務自有其向心力，吸引了感到有衝動、有欲望、有義務把偉大的作品從文明的廢墟中解救出來的人們。他們要通過翻譯賦予這些偉大作

品以新生。其好客的旅店既是粗暴的又是慷慨的，能容納絕對可譯和絕對不可譯、忠實和背叛、獲得和喪失等悖論。“翻譯意味著歡迎。”^⑨歡迎的對象是語言中的他者，文化中的他者，以及人性中的他者。單一語言無法表達任何思想，尤其是哲學的語言、文學的語言、以及地球上可以想像得到的任何群體的語言，因此必須向其他語言敞開，吸收其精華和力量。翻譯的好客和譯者的好客也是語言的好客。這種好客既含有忠實的許諾，也含有不忠實的威脅。它含有忠實與背叛、對等與不足以及內部翻譯與外部翻譯之間的全部悖論。這些悖論使譯者既感到悲傷又感到快樂，因而給翻譯增加了衍生於翻譯自身的另一個悖論。他們感到悲傷，是因為完美翻譯的目標永遠不能達到，所以他們悲悼喪失，純語言的喪失，語言絕對值的喪失，和完美翻譯的喪失。而他們也恰恰因為這些喪失而感到高興，因為語言恰恰由於這些喪失而更新和發展。事實上，使翻譯成為可能的正是這些喪失，因為在翻譯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文學的絕對值、文化的絕對值以及這樣一個簡單的信念，即，既然翻譯存在，那就是可能的。最終，譯者對喪失的悲悼令譯者幸福，正因如此，喪失也便自相矛盾地變成了獲得。語言的好客是譯者待客的家園，在那裡，“居於他者語言中的快樂與在家接受外來詞的快樂達到了平衡”。^⑩

①②⑤⑥⑦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 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Resistanc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2003, 16(2), pp.237-262,237,238, 239, 239,241,241,250,248,248, 249,249,252,255-256.

③他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文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語成了世界上翻譯最多的語言，但就每年出版的英文書的數量而言，却少有譯入者。”見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09, 104(2), pp. 811-812.

④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180-193.

⑧ Dominico Jervolino,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See also Paul Zumthor, *Babel ou l'inachèvement*, Paris: Seuil, 1997.

⑨⑩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Derrida, *Eyes of the University: Right to Philosophy*,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4, pp. 1,2,5-6,22,220-223,22,170,170.

㉑④③④④⑤⑥⑤⑦⑧⑨ Paul Ricoeur, *O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4, 23; 7, 22; 8; 8; 9; 25; 31; 10.

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Emile Apter, "Global Translation: 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tanbul

1933,"*Critical Inquiry*, Vol. 29 No. 2, Winter 2003, pp. 253-281.

㉜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p. 179.

㉝ Adorno, "Words from Abroad", *Notes to Literature*,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Vo1. 2, pp. 187-188; Emile Apter, "Global Translation: 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tanbul 1933".

㉞㉟ De Man, "Conclusions: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p. 84,96; Emile Apter, "Global Translation: 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tanbul 1933".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81,283,75,293,297,300,24.

㊻㊼ Samuel Weber, *Benjamin's -abilitie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91,92.

作者簡介：陳永國，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84

[責任編輯 桑海]